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北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次试验

——作为儒家经术政治体系的王安石变法

□ 雷　博

北宋熙宁元丰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一直被视作是传统政治中“改革”的典范。王安石变法中包含着儒家传统一个极其重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它不是道德心性之学，也不是一些空泛的政治原理或教条，而是强调经学和政治思想所蕴含的大历史观、战略全局观和体系性国家治理的理念。儒家传统不同于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其关注的始终是现实世界中的治国理政问题。王安石变法的体系架构与核心精神，展示出儒家经学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儒家所思考和回应的，不是眼前的、表层的矛盾，而是大历史演进中的深层次问题。因此从根源上说，也是一种积极面对治理复杂性的学术思想体系。虽然王安石变法在落实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其通盘考虑、全局治理的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积淀的珍贵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也对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富有启示。

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包含学术理论、实践方案与核心价值的整体系统工程

首先，熙丰经术政治体系是将儒家经学运用于新法新政的一次系统性尝试。王安石对《周礼》《尚书》《诗经》《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诠释，为政治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正当性依据，构成一个从顶端俯瞰的改革体系：从文本诠释到制度变革，希望落实为法度、政策与礼文，在政治活动的进程中，也蕴含着寓教于政、启沃人心的人文理想。

其次，执政者针对当时存在的顽症痼疾，以改革变法为取向，通过制度的梳理与重构，从各个层面强化治理能力。尤其是在人才培育、吏治改革、基层治理和经济统筹四个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战略关联与同步性：通过梳理吏治、精简政务来简拔人才，通过人才培育强化吏治管控，同时加强经济统筹与支付能力，用来更好地培养人才。而具有实干能力的人才，则可以在基层治理中进一步推进改革，提升国家的统筹能力和平衡能力。

再次，从核心价值的层面看，这一政治体系不仅包含了“富国强兵”的政治愿景，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开阖敛散，抑制豪强的投机兼并，保护基层生产者的利益，追求经济上的正义与公平。通过“恒产”维护“恒心”，进而以“仁民爱物”的理念将这一经济基础层面的公正性追求提升为政治中的核心价值。

以上三个层面共同构建起经术政治体系的经纬结构，使学术、理念、法度和政策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有机整体：学术不是无关政事的高言空论；政治也不是脱离了理论支持与价值导向的权术机谋。而是以经术为脉络，将政治中的各类具体矛盾进行分梳整合，整体统筹、规划并施设，即王安石所谓“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

治理体系建构必须源于笃实的政治实践，面向具体的实际问题，而其成果须具有实效实绩

熙丰经术政治体系体现出当时执政者注重实践的理性思维：它不是对经典进行教条式的照搬移植，也不是披着经学外衣的师心自用，而是对儒家核心价值审慎而理性的继承与运用。经学中的政治理论与义理原则必须面向丰富而复杂的治理实践经验，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其所形成的政策也不能是纸上空文，而必须予以落实。这不仅对于文弊积重的宋代政治具有很强的纠正意义，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具有很强的典范效果。

首先，在经典诠释与应用层面，王安石不是拘泥于所谓的先王成法，而是将经义、历史和当下的切实经验相结合。以实事实理作为标准，发掘经典的深层意义并付诸实用，而不是将经典中的论述作为某种机械的准则加以模仿照搬。

其次，王安石将“理财”视作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在《周礼》的研究和诠释中注重发掘其中的财富管理与经济统筹思想，以“开阖敛散”和“国为民极”为导向，构建良性循环的国家财政体系。通过掌控市场上的物货价格、信息、流通的控制权与流通量，实现对物价的及时调控。这一理念从先秦时代的《周礼》《管子》到汉代的《盐铁论》，一直被视作抑制豪强兼并、加强政府经济权力的重要方式，而在王安石这里更强调对国家的经济管控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的提升：不仅是财富的数量累积，更重要的是在敛散过程中的渠道建设，这种沟通政府与基层之间的财富流通通道，是国家经济能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良性的财政体系也可以为吏治、军制等方面的改革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次，熙丰经术政治体系特别注重在治理中构建务实的人才培育和选拔机制。其贡举与学制改革，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将隋唐以来以诗赋、辞章为主的进士科改为试策论，影响延及明清。另外，罢废原来的明法科，创设新科明法，在官吏选拔中加入试刑法等改革措施，引导学风向重法律、通刑名的实用方向变化，以加强官吏亲民厘务的执政能力，使人才选拔趋向多元化、专门化，同时针对政治需求趋向复合化。而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中，则以事任和绩效为中心，建立选拔与考评的机制，以事任人，以事选人，以人成事，通过人将法度落在实处。

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这种笃实的精神十分难得，而将这种精神制度化、规范化，更需要宏大的战略眼光和坚强的政治意志。笃实本身就是一种勇于突破思维定式和政治教条，勇于面对弊病，勇于挑战既得利益的政治魄力。可以说，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改革中，求实的信念与有所作为的意志，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宋代以来，有诸多学者对王安石的理财观念提出了批评。在传统语境中，批评者多引用孟子“义利之辨”和《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古训，认为只要言理财，就是法家的“管商之术”，为君子所不取。而现当代的批评者则认为王安石的政策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法则的自发调节作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伤害。

这类批评意见不无道理，但也可能会将国家和社会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当代学者在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宋代经济史时，通过大量数据的参较，显示出在整个熙宁元丰时期，土地开发、水利建设、户口多寡和市场繁荣度等方面的经济数据均有比较大的提升。也就是说，在经济治理中，不一定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简单关系，事实上存在着“国进民进”的可能性。这一点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等史书中也可以找到诸多旁证。类似的观点虽然还需要更多更细密的研究予以充实，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治理的重要角度。

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法规、制度、政策的框架，同时也是对道德伦理、社会风俗与人心趋向的塑造与规范

熙丰经术政治体系是一个“寓教于政”的体系，但并不是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官长对民众的教化，而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教”，是对于执政群体——包括皇帝、官员、士人的培育与塑造，特别强调执政能力和执政意志的系统性建设。

首先，以儒家经术为核心理想和价值观，培育最高统治者政治意志与执政能力。一方面，在探讨学问，评论历史的对话中，帮助皇帝从政治原理和历史经验层面提升自身治国理政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处理政事的辩论与抉择中，培育皇帝的大局观、决断力和战略思维。这对于当代政治家在实践中自我反思与磨炼，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其次，通过改革人才培养、选拔与晋升制度，对症吏治中的痼疾，希望借此改变旧有的官场风俗。在王安石看来，官僚政治的一项严重弊病就是墨守成规——“祖宗之法”被放大成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各种政治力量会将符合自身利益与习惯的内容填充进去。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对长远的、结构性的战略问题视而不见，反而汲汲于一些琐碎无聊的官场细节中，无谓消耗政治决策中的精力与注意力。这是一项需要顶端设计的系统工程，包括观念塑造、理财养士和选任培育三个维度：观念塑造的维度提供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层面的理念支持和改革的思想资源；理财养士为选任提供国家财政支持，而选拔出的人才则从另一方面改革和优化制度。同时，选任拔擢教育官员的过程，也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三者各成体系而又交互支持，共同推动改革的全局。

再次，通过对国家重大礼仪进行系统地考辨和厘正，营造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氛围。礼仪是政治的重要内容，礼制也是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而有着整齐秩序、濡化人心之功能的礼教，则是“寓教于政”的政治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对国家典礼进行规范化的努力中，同时包含着礼的法令化与制度化。同时，对国家礼仪的标准化，也就是对古礼的精髓进行系统地恢复与重建。这不仅更进一步强化了典礼的权威地位，也营造出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氛围，使政治脱离因循守旧的格局，而以某种更高远的理想为典范蓝图。这一点对于大国的治理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儒家经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于：不仅仅是保存典故的文献经典，也不是具有绝对真理意义的宗教经典，而是从过往经验和当下实践中提炼总结出的问题意识、思考逻辑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经学可以为治理引入理论基础、历史视野、道德原则和务实求变的进取意识，为容易趋向于因循僵化甚至抱残守缺的现实政治带来变革的诉求、方向与动力。

总而言之，北宋熙丰经术政治体系不是照搬儒家经典，也不是凭空进行臆想构造，而是在历史因革的线索中，以经学义理为指导思想，反思和探索长时段的历史问题，并通过制度层面的建构规划政治蓝图。这一治理思想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历史观基础之上：历史不是一种简单的绵延与陈陈相因，而是有目标、方向和动力的，因此政治人物也不能随波逐流，而需要张扬自身的主体性，有所追求，有所作为。儒家经术政治体系的核心精神是一种富有政治智慧、实践理性、人文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追求，它植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内在逻辑，不仅是传统政治模式下诞生的宝贵思想资源，也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仔细思索体味。

史镜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 徐问笑

公元1036年（景祐三年），范仲淹通过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吕夷简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对宰相把持朝政、培植党羽等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同时，他主张皇帝应改变现有的用人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这一行为，对时任宰相之高位的吕夷简而言，不啻是对其权威最严重的挑战和打击，他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以“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对范仲淹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最终，范仲淹不敌吕夷简的老谋深算，无奈落得个“被罢黜，改知饶州”的下场。

到了饶州后不久，范仲淹的夫人李氏，便因病去世了。这对重视家庭亲情的范仲淹而言，应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范仲淹两岁丧父，后随母改嫁到长山朱氏，一度被改姓为朱，直至他考上进士，都是用的朱姓。不管是范仲淹本人，还是其当世之人，以及后来诸多范仲淹的研究者们，留下的各种存世文稿中，对范仲淹和其继父的关系，并没有过多的评论和判断。但是，苏轼曾有一句“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便可知道大概情况，范仲淹在亲情方面，应是很失意的。范仲淹进入仕途后，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不但接母亲到身边赡养，以尽孝道，且对同母异父的三个弟弟和本家的范氏族人也都有照拂。

话说到这里，只是想表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也有因幼时亲情缺失，存有情感脆弱的一面，而他的夫人李氏，无疑是给予他生命中最多温暖和柔情的一个人。所以，看似任何时候都战不胜、打不倒的范仲淹先生，无论政治上遇到多么强劲的对手也愈挫愈勇的他，在此刻却败给了莫测的命运，在政治失意与痛失所爱的双重打击下，这个意志坚定的勇士终于倒下了，他因此而重病不起。这应是自范仲淹进入仕途后，所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人生考验了。如果他就此沉寂，一蹶不振，或就此屈服，明哲保身，那么，历史也将因此而失去绚丽的一页篇章。然而，正因为他是范仲淹，即使一时蒙尘，他也依然是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因为，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能够颂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绝世名句的人，也唯他一人了，他是注定为千世万代所景仰、为历史所铭记的人。

范仲淹的好友，其时正在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目睹范仲淹所经受的一系列不幸，为了劝诫范仲淹，特别作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从此闭上嘴巴，少管当权者的闲事。范仲淹却立即回写了同题《灵乌赋》给梅尧臣，斩钉截铁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言一出，凛然大节的气势顿时跃然纸上，后人无法得知，当梅尧臣看到这句话时，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这简直就是一份战士的宣言，范仲淹在向世人表明，为了坚守自己心目中的大义，他是无惧任何牺牲的。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于天圣八年，给晏殊的书信中所提及的内容：“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是的，这就是最真实的范仲淹，他的心中装得下“天下”，却唯独装不下一分私心，无论何等困厄，他的内心始终是自由的，无改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本色。

按时下的标准看，范仲淹应该属于全能型人才，他进可以为相，出可以为将，且无论在哪个位置上，他都充分显示了自己出色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施政手段。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大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古以来，便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说，而宋词的璀璨，即使有前两者的珠玉在前，也依然无损其夺目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此三者，分别代表了各自朝代的文学之盛。然而，古代的文人们，从来不曾满足于自己在文学上的不凡造诣，他们心怀天下，往往更热衷于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念。

纵观古代历史，若论哪个朝代是最受文人欢迎和推崇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出宋代之右了。不但文人的政治地位最高，且只要不犯谋逆大罪，便可以“刑不上大夫”，性命之忧一般是不会有的。所以说，范仲淹先生还是很幸运的。正是因为有了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施政主张，文人才得以在参政、议政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也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范仲淹为首的这一批治国名臣和文学大家，才能够脱颖而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篇章。

中华春秋

办学主体多元化 学校事务自主化

——基础教育调研札记之二

□ 曾业松

所有国家都把政府作为办学主体，但并不排斥其他办学力量。我们考察的国家大多重视民办教育，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注重发挥家长的作用。国家、社会、学校、家长角色不同，责任和分工不同，但都朝着办好学校、教好学生一个共同的目标，承担应尽的义务。我国面对庞大的教育规模和日益增多的教育需求，政府单凭自身有限资源是不可能包办教育的。如何改变公立学校“一支独大”的现状，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办学体制和经验。

民办学校大有可为

我们考察的国家都很舍得投资教育，私立学校也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最高时达7.7%，曾居于世界首位。现在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中，90%以上都是公立学校。与此形成互补的是，公立学校周边还有不少私人学校。在北海道听家长反映，二三年级学生放学后，60%~70%的学生到私立学校接受功课辅导，或学习技艺、培养兴趣和特长。至于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绝大多数是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院校占有突出地位。2013年，日本私立大学606所，占大学总数77.5%，学生占在校总数73.5%。新加坡政府担负着中小学和大学的主流教育。而在非主流教育领域，私人学校在补习、商业、电脑、语言、艺术等教育方面则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从2012年开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4%，2013年就超过2万亿元。这些经费既要投入高等院校，也要投入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等，生均经费远低于上述国家。政府财政压力巨大，有的贫困县教育投资已占到财政支出的30%~40%，个别县达50%以上。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民间资本和人才等资源丰厚，企业家和社会公益人士不乏投资教育的意向。因此，我们应更多发掘民间教育资源，实行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并举并重，构建国家、社会、民间共同投资教育的新格局，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在大城市，当随迁子女大军随着城市化浪潮滚滚而来时，应采取公私合营、购买服务等多种模式，创办民办学校，尽可能保障随迁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学校要有更多办学自主权

芬兰公共教育支出占GDP6.6%。但他们并不乱“砸”钱，而是把资源配置在义务教育和学习迟缓者等“最需要的地方”。九年一贯制教育经费全由政府负担。其中初中生平均每人每年经费达8200美元。政府花巨资办教育，但办学自主权都交给学校。教育部四年制定一次核心课程纲要，只定一个框架，不做细节化的具体规定，也不实施学校评估制度。学校事务决策权都在董事会。如Sakarinmaki小学，为便于帮助后进学生，提高整体教育质量，自己决定实行小班小校，班级人数不超过20人。至于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等，则由任课老师全权负责，自由选择。

我国是“一张卷子”评定教育质量，决定学生命运，学校老师自主空间狭窄。随着城镇化发展，亿万劳动力转移进城打工或定居，数千万子女的“走”和“留”，形成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两个大规模群体，学校布局不得不进行调整。城镇学校做加法，农村学校做减法，陷入进退两难困境。学校存亡、老师何去何从均操之于人，怎么谈得上自主办学。尤其农村为解决学校撤并、儿童上学距离较远等问题，创办了大批寄宿制学校。由于宿管教师、工勤人员编制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教师除正常备课上课改作业，还要照顾学生穿衣吃饭和睡觉。久而久之压力越来越大，以致精神疲劳，产生职业倦怠。

让家长依法担起教育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很多国家的家长们热衷于学校教学活动。在札幌市绿丘小学访问时，家长委员会会长佐藤佳子始终陪同，兴致极高，和我们交流十分活络。据介绍，她带领的家长团队，既像学校的主人，参与策划各项活动，和老师一起阅看学生作业，也像学校的义工，平时主动帮助学校协调各种关系，自觉自愿为学校出钱出力，学校开运动会义务担当工作人员。在新加坡万慈学校，一些家长经常到学校举办“亲子阅读工作坊”，和学生一起阅读，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在芬兰，学校大量组织参观博物馆等户外校外活动。这些活动也多由家长委员会组织，并由家长提供费用。

在中国，家长对教育的参与明显两极化。一边是望子成龙成凤，不惜血本投资教育，甚至成为“虎妈狼爸”。当随迁子女涌向城市就读，造成“大班大校”时，一些家长抱怨之声不绝于耳，但真心奉献爱心、帮助学校化解难题的远没有埋怨指责者多。另一边是光顾打工挣钱，无心过问子女，很多是无奈地丧失父母应尽的养教责任。尤其是部分农村家长对留守子女教育的缺失空前未有。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抽取的样本推算：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21.88%，占农村儿童37.7%；全国每五个孩子中有一个，农村每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生活缺照应、行为缺管教、学习缺辅导，极易导致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人格扭曲，产生畸形逆反心态和极端暴力行为。昆明市东川区老师反映，有的学校留守儿童各门功课及格率只有30%左右。浙江省瑞安市有老师说，有的学生在校学的回家就忘了，甚至被监护者误导了，导致5+2几乎等于0。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出现许多厌学、逃学、辍学的问题少年。屡屡发生的“留守儿童”身心安全问题，以弱小生命触碰社会的神经，告诉我们家长教育的空白和失误，使得留守儿童群体的命运令人忧虑。由此，建章立法强化家庭教育责任势在必行。

教育问题谈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廉美和敬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